



JIJIN JINGJIXUE

激进经济学

〔澳〕布鲁斯·麦克法莱恩 著

务 印 书 馆



激进经济学

〔澳〕布鲁斯·麦克法莱恩 著

朱宝宪 王季平 译

商务印书馆

1993年·北京

Bruce McFarlane

RADICAL ECONOMICS

Croom Helm Ltd, 1982

根据克鲁姆·海尔姆出版公司 1982 年版译出

JIJIN JINGJIXUE

激进经济学

〔澳〕布鲁斯·麦克法莱恩 著

朱宝亮 王季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223-6/F·147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98 千

印数 0—1700 册

印张 8 1/2

定价：5.80 元

中译本序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布鲁斯·麦克法莱恩教授 (Bruce McFarlane) 于 1982 年出版的这本《激进经济学》具有它自己的特点。

近2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文献中谈到激进经济学时,一般指的是从60年代初美国反越战学生运动中产生的激进经济思潮。它一方面尖锐地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弊端,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评了正统学派的或者说是当代的主流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家们认为正统学派的经济学对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贫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生态环境的破坏、工人阶级的异化和帝国主义等严重的经济问题,提不出正确的理论和有效的解决措施。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种病症,而且是由资本主义正常运行中直接产生的,因此只有对这个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根本解决这些经济问题。如果这些持激进观点的学者批判的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它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以及政治、社会和法律等问题时,这些学者则被称作新左派。

阿佩尔鲍默(E. Appelbaum)在他的《激进经济学》一文中,认为激进经济学就是主张废除市场经济,引进(1)生产资料公有制;(2)工人支配工作过程,和(3)真正平等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等社会主义方式的激进学说。^①从激进经济学派所关切的这些问

^① 载于温特劳布编:《现代经济思想》,1977年英文版,第559页。

题来衡量，他认为激进经济学就不能局限于 60 年代开始的现代激进经济学派，而应该上溯到二百多年前，在亚当·斯密建立古典经济学以后不太长的时期内，反对正统经济学的激进经济学就出现了。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激进经济学家吸收了马克思的一些范畴和批判方法：强调生产方式的重要性、谈论阶级斗争、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且尖锐地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主流经济学，不过也吸收了当代美国反传统观念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有关批判大公司控制消费者需求和垄断市场的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在评介激进经济学的同时，着重指出它与另一个重要的、批判主流经济学的新剑桥学派（他称之为意大利-英国剑桥学派，一般称之为新剑桥学派或新李嘉图学派，本书作者有时称它为第四阶段的剑桥学派）之间的区别。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琼·罗宾逊（J. Robinson）、卡尔多（N. Kaldor）、斯拉法（P. Sraffa）和帕西内蒂（L. Pasinetti）等人。他们反对主流经济学假定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可以任意变动的说法，因而否定了主流学派的边际生产率的分配理论，强调投资、就业、储蓄和价格在决定收入分配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结合以上的说明，就可以看出这本《激进经济学》的编写特点。首先，作者认为激进经济学是一种批判正统经济学的思潮。和阿佩尔鲍默的看法一样，承认它在古典经济学建立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产生了。19世纪初，法国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美国凡勃仑的制度学派的经济思想、英国霍奇斯金（T. Hodgskin）等人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思想和主张单一税的美国亨利·乔治的经济思想，在本书作者看来它们都属于最早期的激进经济学。

第二，作者与萨缪尔森的看法相反，不但把新剑桥学派理论归于激进经济学，而且把它放在本书的最重要位置上，占的篇幅也最

多。诚然，新剑桥学派对当代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最强有力的批评，但是把它看成是激进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如果作者不是唯一的一个的话，也是委实不多的。他的这种安排和他对激进经济学的认识是一致的。或许是由于他对新剑桥学派的充分肯定，因此，在本书中对于6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现代激进经济学几乎没有涉及到。

第三，和一般的观点相反，作者认为激进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着根本性区别。虽然如此，作者仍然以独立的篇章来论述马克思经济学和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

在了解本书的编写特点之后，应该对激进经济学的批评对象正统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加以说明。正统经济学原来指的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他的不朽著作《国富论》(1776年)奠定了古典学派的理论基础。自此以后，古典学派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为时一百多年。所谓正统经济学也就是该时代为公众所承认的主流经济学。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之一在于他提出了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作为反对重商主义政府管制经济的思想武器。他认为顺应自然秩序的社会经济活动才最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人们都有利己心，盘算的是自己的利益，本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在这种场合，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例如，人们进行储蓄本意是改善自己的境况。在这样做的时候，却增加了国家的资本存量；他们把这些资本用在最能盈利的地方，在这样的时候，却生产了别人所急需的产品。因此，只要社会顺应自然，让每一个人都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其结果不但是个人得到最大利益，而且社会也积累了最多的财富。

亚当·斯密还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是自动调节的市场。按照斯密的观点，每一种商品都有其“自然”价格。简单地说，它决定于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量。这就是他的劳动价值论。当一种商品上

市的供应量低于它的需求量时，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将使市场价格上升。如果市场价格上升到高于自然价格，那么市场力量将使这种商品的供应量增加。反之，在一种商品供应量大于它的需求量时，市场价格即将下跌，如果市场价格下降到小于自然价格时，市场力量将减少这种商品的生产和上市量。在这两种情况下，市场价格将趋于与自然价格一致。此外，生产者之间为获取利润而进行的竞争将自动形成适应于消费者所希望的生产格局。

斯密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顺应自然秩序，通过供求双方的自由竞争和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就能平衡商品供求，不但个人得到最大利益，社会也积累了大量的商品财富，因此主张应该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听任个人追求各自利益，以求经济自由主义的实现。

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为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所继承，并且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但是亚当·斯密还认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已发生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自然价格或价值则决定于生产成本，即决定于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支付的工资、地租和利润三种生产要素收入的总和。他的这种要素收入价值论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所继承。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家深信资本主义是进步的、自然的和永恒的制度。但是随着产业革命的深入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者遭到破产，广大劳动群众日益贫困，阶级对立愈加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西斯蒙第成为第一个和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决裂的古典经济学家，他认为利润是对工人阶级的掠夺，主张国家对危害公共利益的私人经济行为进行干预。李嘉图社会主义者霍奇斯金根据劳动价值论，认定劳动产生一切价值，资本本身是劳动的产物，利润是全部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从而否定资本生产力论。他认为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求得日益改善的最好方法

只能是实现公平正义，让工人获得并享有他们劳动创造的全部产品。他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反对古典经济学。霍奇斯金虽然承认资本家剥削劳动者，但却反对工人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杰文斯(W.S. Jevons)、奥地利的门格尔(C. Menger)和法国的瓦尔拉斯(L. Walras)几乎在同时出版了说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著作。从而形成了边际效用学派。

他们否定古典经济学从供给方面说明劳动量或生产成本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认为价值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而是人对物的主观评价。有价值的东西必定对人有效用。价值的形成还要以物品的稀少性为前提。稀少与效用相结合才形成价值。价值的大小是以边际效用来衡量的，就是以购买的最后一单位商品(即边际单位)的，也就是以满足人们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商品的效用量来衡量的。

边际效用学派建立了三个基本原理。第一个是等边际(equi-marginal)原理：消费者分配他们的支出要使每一单位的边际支出所产生的利益(即效用)都相等。生产者使用他们的资源要使每一单位的边际资本所获得的利润都相等。第二个是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当一种商品的消费量增加时，边际单位给予的满足减少了。它与古典经济学中生产领域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相对应。第三是一般均衡原理。根据以上两个原理，一国经济好象是由各类商品价格及其购买量之间形成的一张复杂的关系网。消费者支出的任何变动，通过生产和价格的相应调整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系统。在竞争性经济中，整个系统会自动地进行生产调整以配合需求的变化，从而达到一般的，也就是全面的均衡状态。

边际效用学派从商品的需求一方，即从商品的效用说明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从而否定古典经济学从商品的供给一方，即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或生产费用说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到了

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值论,却把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论点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古典的经济学。他认为商品价值或其市场价格决定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作用,缺一不可。供求双方的相互作用,如同亚当·斯密分析过的竞争性市场的作用一样,最终将导致均衡状态的实现。但在不同的时期中,供求在决定价值、价格方面所起作用的重要性不一样,在短期中,需求即边际效用所起的作用大,但在长期中,却是供给即生产费用起的作用大。总的说来,生产格局决定于千百万消费者各自的消费决策。

同样是在19世纪末,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J.B. Clark)将边际分析方法和报酬递减法则应用于收入分配理论中,提出了边际生产率论,成为新古典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他的理论,当资本量不变,企业继续追加劳动时,工资决定于最后增加的一单位劳动所增加的产品价值(即劳动边际生产率)。只要增加劳动所增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超过应支付的工资,企业就会增雇工人,因为增加的收益大于增加的工资成本,从而增加了企业利润,如果增雇的工人的边际生产率小于支付的工资,企业不会增雇工人。因此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决定于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水平。同理,当劳动量不变,资本所得到的利润决定于最后增加的一单位资本所增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根据边际生产率理论,所有的生产要素,不论是劳动、资本还是土地,它们的报酬(收入)恰恰等于它们在生产中对边际产品价值所作的贡献。工人接受的正是他们所赚得的那一份。

马歇尔和克拉克的理论,可以说是把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加以边际概念化了。新古典经济学不但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顺应自然秩序、进行自由竞争、能够自动调节的,而且是阶级关系和谐协调的经济体系。

在理论上,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动调

节功能,以此强调政府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必要性。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依据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论点,认为人们从生产中获得收入是用来购买其他人生产的商品的。因此,从整体经济来看,总支出等于总收入,也等于总产品。由于企业判断失误,很可能产生局部的生产过剩,但是企业会立即进行纠正。因此产品生产过剩只是暂时的,不会酿成普遍的生产过剩。

其次,收入中必然有一部分储蓄起来不用于现期消费,使总支出低于总收入或总产品,这种情况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失业增加。新古典经济学家否定了这个论点。他们指出人们将其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企业就会借用这部分储蓄资金,并支付借款利息。企业将用这笔借款投资于机器设备等资本品,从事生产,赚取利润。因此总收入中一部分由家庭用于消费,一部分由企业用于投资。利息率是使家庭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的调节机制。因为,如果投资量一定,储蓄量增加,表明可贷资金增加,利率因而下降,借款成本降低,刺激投资相应增加,使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从而自动地维持总支出于充分利用的均衡水平。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不但在金融市场上,而且在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上的各种价格如商品价格、工资和利率等都能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各个市场可以自动调节到各自的充分利用或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例如如果有失业存在,只要他们要求的工资率不超过其边际产品的价值,他们就会被企业所雇用,从而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坚持自由放任政策,通过价格体系的自由运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将自动地趋于它的充分就业水平。

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代替了古典经济学,成为本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主流经济学,因而也就自然地成为当时的正统经济学。在

这一时期中，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仑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上，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过分注重静态均衡使它自己变成过时的东西，强调孤立的个人利益，而忽视整体社会的利益，采用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而排斥了对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制度及其变化过程的考察。总之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从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为现行秩序辩护的经济学。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黯淡无光了。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一本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失业的原因，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有关论点和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的重要著作。出版以后迅速为西方经济学界所接受，从而开始了所谓的凯恩斯革命。

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中，否定了新古典理论的总需求总是等于充分就业时的总收入这一基本命题，也否定了新古典理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会自动地趋向于充分就业水平的论断。

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中，由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构成的总支出起着重要作用。总支出水平决定了就业和产量水平，从而决定了总收入水平。

凯恩斯认为消费支出是收入的函数，它随收入的增减而增减。一般总是小于收入的。两者的差额就是储蓄，它的存在使总支出发生一个缺口。储蓄者和投资者是两类怀着不同目的的人群。投资为的是获得利润。投资的规模不但决定于借款的成本即利率，更重要的是决定于预期的投资收益率。预期受经济前景等许多因素的影响极易变动，因而各年的投资额起伏不定，很难和储蓄额相一致。

凯恩斯还认为价格和工资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认定的那样容易变动。他指出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早已出现了巨型企业

和巨大的工会组织，它们分别抵制价格和工资的下降。即使在危机期间，正像新古典经济学推断的那样，工资能够普遍下降，工资成本固然减少了，但另一方面，工资收入者的总购买力，即其总需求也就减少了，影响所及，不但不能增加就业，反而进一步降低了产量和就业。因此，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行调整到充分就业水平，而是经常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认为，政府不能再继续执行自由放任政策，必须干预和调节宏观经济。在危机时间，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削减税收、甚至用举债方式，增加政府支出，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才能解救危机。

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但为西方经济学界，而且为西方各国政府所接受，并且把他的反危机措施付诸实施，凯恩斯理论代替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战后的主流经济学。适应这种变化，西方编写经济学教科书的结构也作了根本性的调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他1948年初版的《经济学》一书中，第一次以凯恩斯理论为主体，把新古典理论放在次要地位，宣称国民收入是该书贯彻始终的中心主题。在50年代，萨缪尔森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安排，理论化为“新古典综合”。根据他的说法，按照凯恩斯的就业理论，通过政府调节政策的适当运用，使新古典理论赖以成立的充分就业的前提条件得以生效，新古典理论就重新得到应有的信誉并恢复了生机。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也就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通过新古典综合，一同成为50和60年代的主流经济学，成为当今的正统经济学。

但是也就在这一时期，新古典综合理论开始陆续遭到新剑桥学派、现代货币学派、激进经济学、合理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攻击。到了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滞胀情况以后，这些学派攻击的火

力更加猛烈，双方展开激烈的论战。其中特别是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论战最为著名，一般称之为剑桥论战。它们的主要论点已被西方经济学界所接受，但是这些论点不足以打破新古典综合的基本理论结构，目前的情况是，这些论点已逐渐地结合到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的基本理论结构中。

以上的叙述主要是为本书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以下结合本书的内容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本书除序和绪论外，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正统经济学和它的问题，第二部分为激进的反应，第三部分为马克思经济学，第四部分为社会主义的不同选择。从内容看，主要是对正统学派的、新剑桥学派的以及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方面理论进行相互比较和评论。作者对其中的新剑桥学派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在绪论中，作者提供了19世纪以来，当时的正统理论和激进理论争论的历史情况。然后重点说明双方有关边际生产率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有效性的争论，以及正统学派关于公共领域理论中所表现的社会主义思想。

本书第一、第二部分主要是介绍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其中第一章说明现代经济学，也就是正统经济学的哲学偏见，指出它对经济学下的实证性的定义和方法论的缺陷。作者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只追求“理论的完善”、“客观性”和“科学的精确性”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保守的政治观点，而那些既能“追求精确性”，又能明了整个现实的经济学家，也能够画出一幅真实的图画，从而为他强调新剑桥理论提供依据。

第二章剑桥学派经济学。在这一章中，作者把剑桥学派经济学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四个发展阶段就是现在一般称为新剑桥学派或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本章中开始具体介绍新创

桥学派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依次介绍的是哈罗德的经济增长模型、卡尔多的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模型和琼·罗宾逊的《资本积累理论》(它也是一种经济增长模型)。

西方经济学界对哈罗德的增长模型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第一次将凯恩斯的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说明一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所具备的条件。它开创了战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哈罗德、卡尔多和琼·罗宾逊的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的多马、索洛、斯旺等人的增长模型共同组成现今的增长理论。

第三章是对凯恩斯和卡莱茨基理论进行的比较。卡莱茨基是波兰籍经济学家,他于1933年以波兰文和法文发表的论文,先于凯恩斯得出了与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得出的相同的结论。他被认为是新剑桥学派的先驱者之一。作者认为卡莱茨基的理论分析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因此在政治态度上,凯恩斯反对社会主义,而卡莱茨基只反对专制的,忽视客观实际的社会主义。

第四章开始时讨论的是康德拉捷耶夫的长周期。由于他在本世纪20年代预言,在1971年左右将会发生一场严重的萧条,引起一些经济学家发表了世界末日理论或模型。作者批评了其中的一位,即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在《人类还有未来吗?》一书提出的发达国家将因人口众多,过度污染和不能再生的资源的耗竭而发生爆炸。本章主要批评海尔布伦纳的这些论点。

在70年代初,还有一些类似于海尔布伦纳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罗马俱乐部赞助下,麦多斯等人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他们预言,如果目前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的增长势头继续不变的话,一百年内人类即将毁灭。他们的论点引起西方经济学界一场辩论。他们的预言遭到否定。但是直到现在麦多斯等人提出的问题依然是紧迫的,亟待妥善解决。

第五章是李嘉图经济学和激进派为其带来的复兴。斯拉法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是新剑桥学派的重要理论支柱。一般认为它渊源于李嘉图经济学。本章先评价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然后介绍斯拉法的理论及其特点并和马克思的论点相比较。作者认为斯拉法的著作是批判边际经济理论的序幕。由于斯拉法的著作渊源于李嘉图的理论，因此新剑桥学派也被称为新李嘉图学派。

第六章是新李嘉图主义者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作者指出，从70年代开始，新李嘉图主义者斯拉法、加雷格南尼及他们的追随者开始使用新李嘉图学派的范畴考察处于经济和政治危机情况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时，遭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本章比较了李嘉图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有关分配的理论，说明各类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李嘉图学派的反应。最后提出新李嘉图学派在五个方面的贡献，证明它的理论既区别于正统经济学，又不同于马克思经济学。

本书第三部分介绍马克思经济学。其中第七章比较正统的和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就是说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特点。

第八章是列宁的革命经济学。重点说明列宁在与民粹派的斗争中，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意味着工人和剥削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这一重要观点。在《论所谓市场问题》和《市场理论问题评述》两文中，资本品工业与消费品工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产生出来的社会关系问题。在农业方面，列宁抨击了民粹派为小农户唱颂歌的作法。

第九章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者写作本章的目的首先是把早期的和近期的帝国主义依附论与作为考察80年代情况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开来，并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

其他两个马克思主义派别——其中之一就是罗莎·卢森堡学派——的有关理论进行比较。作者特别以战后印尼的经济发展来证明罗莎·卢森堡的主要论点，即帝国主义发展铁路和港口以便能继续扩大对“内地”或“殖民地”经济的商品输出，其结果之一将是“内地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解放，以前的资本实现了它的剩余价值”。

第四部分是社会主义的不同选择。其中第十章为苏联的“价值规律”。作者指出，在1943年，苏联开展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讨论，而1945年沃斯涅辛斯基在其著作中赞同价值规律，主张苏联应放松一些过度中央化的计划体制时，却被斯大林以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枪毙了。但斯大林在他1952年完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却又承认在苏联经济中价值规律有一定的作用。

本章主要讨论的是1965—1977年苏联的“柯西金改革”。由于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阻碍，自1970年以后改革所带来的变化都逆转了。

第十一章也是本书的最后一章是东欧工人自治的政治经济学。重点分析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的成就和产生的问题。作者认为东欧势态的发展会与扩大市场力量的努力背道而驰。

我国经济、财经院校都开设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课程。讲授的基本上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容。本书涉及对它的大量评论，可以帮助学者深入地了解主流经济学的特点及其缺陷，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

本书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介绍，可以帮助学者了解目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有关苏联、东欧各国经济改革的说明可以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参考。

朱宝宪和王季平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将本书全文译出，译文忠

实原作、通顺流畅,为我们经济学界提供了一本有用的参考书。特为之序。

范家骧于燕东园